

左倾二十年

1957—1976

袁永松 王均伟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021685

ZUO QING ER SHI NIAN

左倾二十年

1957——1976

袁永松 王均伟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9 号

左倾二十年

袁永松 王均伟 编著
责任编辑 王寿彭 杨季明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河南省辉县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2 13.5 印张 32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 000
ISBN 7-5048-2239-6/D·143 定价: 7.95 元

前 言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的目的在于从浩繁的材料中整理出这二十年间左倾思潮的历史线索，回顾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及其带来的严重危害。为了系统、准确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1921—1956年间我党历史上的左倾阴影；不得不延续到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之后掀起的防“左”、反“左”新高潮。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

我们大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强盛满怀激情。我们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始终忠实于冰冷、严酷的历史，但我们的笔锋饱蘸热情的向往——向往民族振兴的未来！于是，我们不愿满足于史实的陈述，不愿局限于决议、政策的定性结论上，总想表达些更多的东西。我们究竟表达了些什么、表达清楚没有，不便先行说明，不敢自行妄断。只有留给尊敬的读者们去评说了。

本书编撰人员：袁永松、王均伟、余凌云、康鑫、韩骏、章铭、郭保胜。全书由袁永松、王均伟统稿，王

寿彭老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金羽教授终审了稿件。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陈明显教授的悉心指导。何德龙、李天白、吕明军、滕裕生、李向鸿、高金卿等作了大量工作，农村读物出版社的杨季明、高晓彬、王杰秀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恳请专家学者、广大读者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以帮助我们改正、提高，便于再版时订正。谢谢！

编 者

1992年2月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

摘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再回首，恍然如梦

——1921—1956 左倾思潮之回顾

..... (1)

1. 法兰西人的偶然创造 (2)

2. 不该忘却的语录 (3)

3. 龙种怎样生出了跳蚤 (6)

4. 试解“左”从何处来 (35)

5. 走出本本，拥抱真理 (45)

6. 若明若暗的左倾阴影 (50)

第二章 沉重的 1957..... (56)

1. 莫斯科吹来撩人的风 (56)

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61)

3. 要下一场毛毛雨 (81)

4. “阳谋” (92)

5. 走进误区 (105)

第三章 跃进！跃进？跃进 (110)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12)

2.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 (115)

3. 放卫星 (120)

4.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29)

5. 跑步能进入共产主义吗 (139)

6. 卫星的坠落	(158)
第四章 “左”风吹雨洒庐山	(161)
1. 群贤毕至神仙会	(161)
2. 隐隐雷声	(173)
3. 狂飚骤起	(182)
4. 庐山大转向	(190)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0)
1. 呼唤海瑞:短暂的文化繁荣	(200)
2. 阴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07)
3. 舵手背后的黑手:枪杆子和笔杆子	(218)
4. 文苑奇冤:尽皆雨打花落去	(229)
5. 高潮迭起:从“合二而一”到 《海瑞罢官》	(240)
第六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250)
1. “哨兵”点燃了导火索	(251)
2. 林彪的“枪”	(257)
3. “赫鲁晓夫”睡在“神”的身边	(264)
4. 第一张大字报和“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272)
5. 狂潮是红色的	(281)
6. “野”火烧遍全中国	(292)
7. 四个老帅打了阻击战	(303)
8. 中国最大的冤案	(314)
9. 上山下乡大运动	(328)
10. “571”工程	(339)

- 11.把孔老二拉出来 (349)
- 12.“死不悔改”的邓小平 (357)
- 13.1976:泪雨交织着血雨 (367)
- 14.梦。梦? 梦! 梦..... (380)

第七章 反“左”正未有穷期..... (385)

- 1.昙花一现的“两个凡是” (387)
- 2.走出现代迷信 (392)
- 3.太平洋作证 (400)
- 4.走向新世纪 (409)

第一章 再回首，恍然如梦

——1921—1956 左倾思潮之回顾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对于极“左”思潮的彻底批判。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一语中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结论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无的放矢，而是基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

要防止“左”，就应当了解这个“左”曾经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善良的人民带来过多么惨痛的灾难；就应当了解为了克服一次又一次肆虐的极“左”思潮，党和人民曾

做出了怎样艰巨的努力；就应当了解极“左”思潮的根源所在。

让我们走进历史。

1. 法兰西人的偶然创造

左和右原本是表示方位的词，怎样成了人人皆知的政治术语呢？这要归因于法兰西人的一次偶然性创造。

1789年的法兰西大地，正酝酿着一场将震撼人类的大风暴。这一年的6月，法国第三等级的代表们齐集巴黎，他们宣布自己是全体国民的使者，他们的会议是国民会议。会议在讨论关于皇室否决权的议案时，出现了三个明显的派别。第一派主张给予皇室绝对的否决权，第二派主张应当中止皇室的否决权，第三派则坚决要求完全废除皇室的否决权。从大会主席的座位上看过去，第一派的人正好坐在会议大厅的右边，第二派的人坐在大厅的中间，第三派的人则坐在大厅的左边。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擅长感性思维的法国人给这三派分别起了三个代称：右派、中派、左派。从此，右和左便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流传开来。

右派——保守派，左派——激进派。

从起源看，左派是一个蕴含着进步意义的褒义词。共产主义者在很长的时期都称自己是左派。苏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公开号召“向左，向左，再向左！”博得了一片喝彩。

对于这些如初生牛犊般的左派，连资产阶级学者也给了很多溢美，诸如：

“左派宣扬的是人性的尽善尽美，右派则宣布人是虚弱的、肮脏的。”

“左派认为人的本性美德是公平地赋予每一个人的。”

“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左派。”

历史发展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过程是变幻不定且往往与初始背道而驰的。

给左字加一个引号，“左”就成了非左，假左，成为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一种十分可怕的怪物。

从“左”发展到极“左”，就完全背离了它的原初意义，蜕变成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反动思潮。

如果在极“左”的内核外面再修饰打扮一番，搽点胭脂香粉，就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一样，成为供人们茶余饭后嘲笑消遣的小丑形象了。

但是——很多人不愿看到这个“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指出来，披上羊皮的狼能欺骗不谙世事的孩童，披上华丽外衣的极“左”思潮也可能欺骗、迷惑甚至煽动善良的百姓，而一旦与权力相结合，它就能践踏、摧残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感、价值和文明生活。“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感谢“文革”这以前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应该再出现的悲剧、丑剧、闹剧。它的警醒意义不是对一代人、一国人有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耻辱架上，应该有它永久的一席之地。

2. 不该忘却的语录

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里，“左”的潜流不时翻起几朵蛊惑人心的浪花。对此，列宁进行了系统辛辣的批判。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于今天防止“左”不无启迪意义。

1918年，为了给饱经战火的人民提供喘息机会，为了使

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得以在帝国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在列宁的极力主张下，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个条约受到了“左”派的猛烈指责。为了回击那些不负责任的攻击，列宁撰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作为回答。

“左”派的阶级实质是脱离人民大众的，丧失阶级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小资产阶级。列宁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

“左”派的特点是光吹肥皂泡，而拿不出受人民支持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夸夸其谈，这是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列宁说：“对于有这种习气的人，一定要给以惩罚，至少要加以讥讽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因为只会夸夸其谈，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最响亮最空洞的词句来作掩护，借以避免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讥笑他们。

列宁以嘲弄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左”派之“左”的思想根源：“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

“左”派的言论有什么效果呢？“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口头上（当然，他们的最真诚的信念也是如此）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只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这些深刻的见解，精辟的结论很不幸已经被一些人忘却

了。我们特别意兴盎然地看到那些“言必称希腊”的“左”倾理论家，在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刻意打扮自己的时候，对列宁这些发人深省的语录却是那么谦逊地保持着沉默，这不很耐人寻味吗？

缄默本身就暴露了“左”派的实质。

在另一篇光辉文献《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颇有市场的“左”派幼稚病的根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一段文字较长，但读起来很有趣，而且这个分析的确说明了问题，不妨推荐给读者诸君：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给别人（以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势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易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

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可惜的是，被列宁所指出应当作为教训的“左”的幽灵，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断纠缠着后继者的思维。作为后人的我们在今天回溯近百年的革命史的时候，不费力气就可以看到那犹如鬼火般若明若暗的玩艺儿。但它毕竟见不得阳光，“左”的最明显的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色厉内荏。无论外表多么唐而皇之，多么风度翩翩，内里隐藏的仍是一颗卑怯的灵魂。而正因其灵魂的卑怯，才更急于更善于伪装自己。这使我想起了列宁的一个巧妙比喻：臭鸡蛋的外壳看上去洁白坚硬，无可挑剔，而一旦打开，却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

为了社会主义改革大业的成功，让我们克服一下，敲开“左”倾理论的这颗臭鸡蛋的外壳，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3. 龙种怎样生出了跳蚤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是伴随着与“左”、右倾错误的不断斗争发展起来的。党成立不久，“左”的苗头就开始在一部分成员中出现。

1922年8月29日。初秋的西子湖畔，丹桂飘香，游人如织。这一天，有7个特殊的游客分别从上海等地来到杭州，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响当当的人物要在这里召开一次秘密的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的合作形

式问题。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马林传达了如下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合作。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李大钊等多数人的同意。出身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和曾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却提出了不同看法，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理由是冠冕堂皇，富有“革命精神”的：国民党的性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岂不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与资产阶级混同了吗？

这种“左”倾观点经过与会者的说服工作被暂时克服了。但张国焘并没有放弃他的“左”倾倾向。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正式讨论共产国际指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从4个月前失败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坚持其反国共合作的立场。他提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这个论调遭到多数与会代表的反对。由于他顽固坚持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三大的选举中，他的中央局组织主任的领导职务被选掉了。

这个把“革命”和“工人阶级”挂在嘴上的张国焘，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却有一件见不得人的插曲。

1922年2月7日下午5点多钟，反动军阀萧耀南调集反动军队包围江岸总工会机关所在地。为了不被一锅端，张国焘下令机关领导人迅速转移到汉口法租界。但这个时候，工人纠察队正同反动军警进行着流血搏斗，项英、林祥谦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与工人纠察队奋战在最前线。在这个最需要组织领导的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却脚底抹油开溜了。只见他脚底生风，专抄小路，直奔入汉口法租界，才总算松了一口气，至于“那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死活，早已不在

他心上。第二天深夜，他又惊魂未定地躲往北京。死难工人的善后事宜，失败之后的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等等一系列棘手的工作，他非常“客气”地让中共北方区委自己去处理了。

不过，由于当时党还在幼年期，有共产国际这个主心骨，张国焘的左倾思想还无法影响到全党。

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造成严重影响的“左”倾错误是瞿秋白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北伐的洪流汹涌到长江两岸。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1927年4月12日向并肩作战的共产党盟友举起了屠刀。鲜血流满了宝山路，染红了黄浦江。三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纠集喽罗召开分共会议，气势汹汹地喊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狰狞口号。

腥风狂啸，血雨漫洒。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惨遭屠戮。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动剧烈的关头，全党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和正确导引。

陈独秀被撤职。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发动武装起义，亮出自己的旗帜。这都是正确的抉择。

与这些正确的抉择相伴的，是“左”倾倾向的发展。

被蒋介石的偷袭闷棍打晕了的人们一旦苏醒，胸中便燃起复仇的火焰。这无可厚非，这是自然的反应。但怎样复仇？是不顾力量对比的显著悬殊，死打硬拚？还是冷静认识客观情况，有计划地组织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准备将来的有效进攻？新的领导人以瞿秋白为代表却不幸选择了第一条路。

八七会议在制订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同时，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不但没有防止，而且还接受了部分“左”的观点。这个倾向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